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公开始末

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究竟是如何披露的,还得从一篇世纪性的回忆文章说起。

特殊的越洋电话

1999年初的一个清晨,85岁的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张劲夫挂断了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陷入沉思。他准备完成一件大事——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故事公之于众。电话那头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他的心情同样激动。他期盼着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故事能被世人所知晓,其中包括他的挚友邓稼先的事迹。

对于“两弹一星”工程来说,最具挑战性和最核心的是科研系统。最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之一,正是当年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

1998年12月10日,《科学时报》(现《中国科学报》)记者刘振坤采访了张劲夫。张劲夫回忆了1956年到1966年中国科学院辉煌的十年。1999年1月24日,访谈内容被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并在《科学新闻》(科学时报社主办的期刊)上发表。

文中并未提及“两弹一星”,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仍从字里行间中读出了某种关联。它就像一个开关,打开了这些人记忆的闸

门。他们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张劲夫,希望他能谈谈中国科学院为研制“两弹一星”所作的历史贡献。

“你呀,应该把中国科学院对‘两弹一星’的工作,写出回忆录发表啊。”杨振宁在那通电话里对张劲夫说,“美国已经出版了中国原子弹的书,你还要保密啊……海外华人很想了解啊!”

张劲夫非常慎重,他专门打电话征询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意见。路甬祥表示:“披露这段历史,我当然赞成……如果需要再谨慎一点,我们可以交给国家有关保密委员会,请他们审看嘛。”在这样的支持下,张劲夫下定决心披露这段事关国家机密的重要历史。

1999年3月11日、12日,刘振坤再次来到张劲夫家中,在两个平常的午后,他第一次听到了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并有幸成为最初的记录者。回到单位的刘振坤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用四天四夜时间将采访录音整理成关于中科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草稿,长达1.6万字。

中央媒体刊发

身在美国的杨振宁的心情同样迫切。计划每年回国一次的他,1999年初春为了此事特意多回来一趟。

早春的北京乍暖还寒,张劲夫辗转反侧,谨慎修改。尽管身体不适,他仍邀请中科院原新技术局计划处处长兼人造卫星办公室主任陆绶观,及中科院原军工史办主任赵萱帮助补充,仅用两天时间就修改完成。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张劲夫与路甬祥商量决定,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和《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两篇文章编辑成内部资料广泛征求意见。

1999年3月中旬,署名张劲夫的16开彩色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分送有关部委和著名科学家朱光亚、钱学森等,他们分别校阅了内部资料,还提出了一些修改补充意见。资料被提交到中央后,也得到了大力支持。

5月5日,新华社将张劲夫的署名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以通稿发出;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时报》等全国各大媒体在头版头条刊发。

表彰23位元勋

在张劲夫的带动和启发下,朱光亚、周光召等一大批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与亲历者,积极接受记者的采访,回忆这段隐秘的历程。

时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提议将这些重要史料汇编成书,以传至久远。1999年9月初,《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公开出版,该书收录了聂荣臻、钱三强的遗作,以及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等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组织者所写的40多篇回忆文章。

1999年8月11日,聂荣臻的秘书告诉刘振坤:“在张老的文章发表后,国防科委副主任聂力(聂荣臻之女)同志征求张劲夫同志意见,提出向中央建议为成功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并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他们的突出事迹。张劲夫同志支持这样做,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在表彰大会上宣读。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科学家的名字响彻中国大地。

胡珉琦

梁从学智闯敌营

1936年初,梁从学(开国中将)受命率红二十八军二四五团和手枪队共200多人穿过安徽潜(山)太(湖)山区进入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这一段路程有多个敌军把守的关卡,梁从学命令队伍换上国民党军装,伪装成“剿匪”部队,他自己也化装成敌军团长。潜山南部边境上的小镇黄泥港有两个民团小队。当梁从学率部队到达时,敌军官便开始盘问。手枪队长立即装作发怒,喝道:“看什么看,还不赶快给我们找个休息的地方,弟兄们都辛苦一夜了。”梁从学乘机把手一挥:“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手枪队的战士们反应迅速,一拥而上,把团丁的枪全缴了,之后拿下了整个据点。

接着,手枪队来到了怀宁县王家河镇。该镇驻有敌民团40多人。手枪队来到街后一座寺庙里的敌民团驻地,发现敌兵刚起床,还在洗漱。梁从学见状故意训斥道:“怎么这样松松垮垮的,要是共军来了怎么办?”敌军头目吓得连连点头:“错了,错了!”梁从学命令道:“把你们的枪都交了,接受处罚!”手枪队的战士闻言迅速动手,将挂在墙上的枪支弹药全部缴了。梁从学把他们集合起来,说明红军俘虏政策,他们才如梦初醒。

临近中午时,部队到达合肥至安庆公路上的重镇高河埠。该镇由保安团一个中队100余人驻守。在敌团部,梁从学借口说要休息,以看住处为名,察看了各个房间。他发现房内挂着许多枪支,而敌兵却很少,就明白大多数团丁都上街吃喝玩乐去了。他对手枪队队长使了个眼色,队员们立即缴了门哨的枪,击毙了敌军官。枪声惊动了正在街上玩乐的保安团团丁,他们赶忙往回跑,一进门便被手枪队控制住了。手枪队队长命令他们排队站好,梁从学进行训话,亮明身份,并让团丁们自由选择,回家或参加红军。

梁从学率领二四五团采取伪装战术,犹如下山猛虎,连闯多镇,奔袭百余里,兵锋直逼安徽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安庆,打得敌人胆战心惊。

张应好

文史杂谈

刘邦“带火”汉代合唱事业

刘邦当上皇帝后衣锦还乡,与故人父老契阔共乐,饮酒尽欢。兴之所至,他即兴吟唱一诗,就是著名的《大风歌》。此歌简单易记,朗朗上口,既接地气,又有王者风范,乃至后世有评“汉高一阙胜乾隆万首”。刘邦当时就在家乡沛县组织了120名儿童熟习演绎,成就了中国最早的唱诗班和童声合唱团。虽然早前在垓下合围时,刘邦已组织过“四面楚歌”这样的“战时大合唱”,但彼时是战场上的战术,不能与此时的合唱艺术相提并论。据载,沛县的童声合唱盛况空前,动人心弦。

随后合唱事业在京城长安开花结果,朝廷从此有了合唱团,设置在未央宫里。《大风歌》是首要曲目,家喻户晓,传唱各方。与此同时,合唱团还演绎了许多当时流行的曲子。《西京杂记》载:刘邦的宠妃戚夫人是个艺术家,“善为翘袖折

腰之歌舞,《出塞》《如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合唱团之外,佳丽居然又自成一团,可见当时合唱艺术水平之高、规模之大。之后,朝廷每有郊祀、庆典、节日等重大活动,都用唱诗班合唱,并沿用下来。

到汉武帝时,出了个音乐家李延年。此人精通音律,为汉武帝演唱了一首歌——《佳人曲》。其词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情意绵绵,动人心扉。武帝惊叹,问:“佳人为谁?”“佳人延年妹也。”李延年遂将样貌秀美、倾国倾城的妹妹推荐给皇帝。于是,皇帝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负责民歌改编、创作宫廷乐曲等。李延年与司马相如合作,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多首音乐作品轰动一时。

杨子明

蒋介石两次推行简化汉字失败

1922年,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向国民党“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详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及实施办法。蒋介石对此非常关注,指示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王世杰立即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此项工作,最后,圈定324个汉字作为第一批简体字。教育部于1935年8月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几个大印书馆准备印刷。

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破坏了中国文化,绝对行不通!并威胁蒋介石:“如果不取消对汉字的简化,以后中央全会举行任何会议,我一概不予参加!”果然,在此后3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

民党召开的任何会议。

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大家公认的理论家,只得妥协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的事。

1952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再次提出简化汉字(此时戴季陶已经去世)。为取得大众支持,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委员罗家伦在报刊上写文章造舆论,同时命令教育部门制订简化汉字的方案。就在蒋介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时,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站出来极力反对。胡秋原认为: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谁简化汉字,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胡秋原的主张立即得到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大力支持,一时间,海内外一些文化界也掀起了一场反对简化汉字的大风潮。大伤脑筋的蒋介石只好指令有关部门以后不要再提此事。

张达明